

2002 年 12 月  
第 4 期(总第 47 期)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of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

Dec. 2002  
No.4(General No.47)

#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功能考察

## ——以“证据适时提出”为中心

麻 华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制度, 导致拖延诉讼、诉讼效率低下、当事人讼累增加、法院权威受损。本文认为, 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强化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和解等功能, 因此, 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 举证时限; 适时提出; 程序公正; 诉讼效率; 诚实信用

中图分类号: D91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759(2002)04-0052-05

## Functional Analysis to Limitation of Proof System

—— On the Basis of Timely Disclosure of Proof

*Ma Hua*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Chinese laws there are no provisions concerning limitation of proof system. This has dragged out litigation, reduced litigation efficiency, increased burden of parties of litigation and damaged courts' authorit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limitation of proof system takes on such functions as realiza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improvement of litigation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limitation of proof system in the civil procedure.

**Key words:** Limitation of proof; Timely disclosure; Procedural justice; Litigation efficiency; Good faith

### 引言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为切入点的, 这也体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诉讼观念的变化。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通过与施行, 其中第 32 条到 36 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时限, 是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重大突

破。制度总是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也可以说, 每一项具体制度的确立都体现着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的不同, 势必会带来具体制度的不同。由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诉讼观念等的差异, 在举证时限制度上各国也存在不同的规定。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看, 关于举证时限大致有两种做法: 一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二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时至今日, 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许多国家基本上不实行

收稿日期: 2002-06-15

作者简介: 麻华 (1977—), 男, 河南驻马店人, 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 从事民法、商法和民事诉讼法研究。

或者废除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而改为证据的适时提出。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比较严格的举证时限制度。其中第 16 条第 3 款第 15 项规定：“法院不允许当事人提出在审前命令中没有的证据和事实，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据活动。”法国在 1935 年的司法改革中，也作了相似规定。德国 1976 年以前实行的也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了克服证据随时提出带来的弊端，1976 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建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我国传统诉讼价值观认为，法官应以追求客观真实为诉讼目标，以实现实体正义为目的，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民事诉讼立法及实务都坚持证据可随时提出。然而，由于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随时提出新证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新证据的范围作出界定，导致当事人极易在诉讼中搞突然袭击，以致拖延诉讼。因此，有必要建立民事举证时效制度，采纳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当事人如逾期提供证据，法院就不承认其证据效力。在一个多元化利益的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或者失衡在所难免。每项法律具体制度的确立，都意味着利益的选择、价值的选择。一项法律制度的深层变革，从来都不是某个法条的简单修订或者某种做法的简单矫正，它同时还经常牵涉到某个部门法整体结构的调整，以及一种制度理念的更新<sup>[1]</sup>。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设立举证时效制度的“主要障碍不在立法技术，而在于对诉讼价值的认识，传统的以实体正义为诉讼目的、以追求客观真实为诉讼目标的诉讼价值观，可以说是设立举证时效制度的最大障碍。”<sup>[2]</sup>因此，在举证时限制度上是采纳证据随时提出还是适时提出，决定了立法者的不同诉讼价值观念。以证据的适时提出为中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具有独特的功能，体现出其独特的诉讼价值。本文将从举证时限制度的功能着手，对证据适时提出所体现的诉讼价值作一分析。

### 一、程序公正的实现

程序公正要求程序本身的合理性、公正性。

谷口安平教授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从利用者的立场看，在收集诉讼资料时，当事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权利保障（即程序保障）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当事人主义的程序保障能够保证公正价值的实现。程序保障意味着让双方当事人都知道对方的主张及举证，并提供充分的反驳机会”<sup>[3]</sup>。“过程的公正是最直观意义上的程序公正。过程的公正意味着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和行为空间。”<sup>[4]</sup>证据的适时提出能够从根本上保证一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地辩论，以使双方当事人具有对抗性，保障原被告的诉讼权利。要求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证据，逾期承担不利后果，也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对于他方的请求和证据在诉讼前有充分的了解，防止对方搞诉讼袭击。证据的适时提出在实现程序公正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证据的适时提出有利于防止当事人利用证据进行诉讼袭击，以此来保障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支配下，什么时间提出证据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和律师的意愿。在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彼此互不了解对方在法庭上要提出的证据，所以在法庭审理阶段攻其不备地突袭对方就成为诉讼策略的主要手段<sup>[5]</sup>。诉讼袭击使对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无法组织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容易导致程序上的不公正。因此，为了保证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对抗机制给予双方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权利，使一方当事人不至因为他方当事人突然提出证据而处于不利地位。证据的适时提出能够使双方当事人及时掌握对方提出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证据，了解争点。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为双方当事人设立了平等的诉讼机会，防止在法庭审理中突然袭击导致另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以及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拖延诉讼的行为。

第二，证据的适时提出能够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由于在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指导下，审判

人员在判决形成之前的任何时候都会接受新的证据,以防止错判。因此,在实践中就必然坚持“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证据的随时提出必然导致庭审无法顺利进行,当事人之间无法进行质证,另一方抗辩权的丧失,其结果是诉讼的拖延。而证据的适时提出能很好地解决上述弊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就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在庭审过程中由于要对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反复质证或者基于对方当事人的要求而延期审理,从而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

第三,证据的适时提出能够真正实现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制的目的在于给予双方当事人不同的审级下获得两次审判的机会,因此,对当事人审级利益的保障也是程序公正的一个方面。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理念指导下,出于对一审法院的不信任或者为了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达到在二审胜诉的目的,当事人有时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证据,直到二审中才提出证据。使得一审法院的审理流于形式,从而也使二审程序的救济机制完全丧失。证据适时提出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证据,在二审期间提出的证据,如果不是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交,法庭不予质证。这样就有效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维护了二审终审制的完整性。

## 二、诉讼效率的提高

在设计诉讼程序和确定诉讼程序的具体内容时,公平正义虽然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但过分强调这一目标而完全忽略诉讼节约的要求,则是违背诉讼自身规律的。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表明,自从理性的阳光驱散了笼罩着诉讼领域愚昧与专制的黑雾,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与简便迅速就始终成为各国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sup>[6]</sup>。实际上,便利和节约是效率的一种比较通俗和简单的表达方式,因为效率就是以比较小的成本获得比较大的收益<sup>[7]</sup>。人们对诉讼价值的判

断首先是程序的公正性,其次是诉讼效率的考虑,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时间的耗费。因此,追求诉讼效率,就必须对诉讼时间加以限制,最好的办法是限制当事人提出举证的时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因为当事人在庭审中由于随时提出证据而导致多次开庭,拖延诉讼。

由于当事人相互之间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可以从中获得诉讼利益。当事人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在答辩期间不提交答辩状或者在答辩状中不提出其掌握的证据,以便在庭审中处于有利地位,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以达到胜诉的目的。有的当事人由于对一审法院不信任,甚至在一审中也不提出证据,以便在二审中能够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就必然要求法庭延期审理,以便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而现行立法对延期审理并没有次数的限制,这就使得诉讼遥遥无期,难以保证诉讼效率。

程序应当及时终结,裁判时间不可遥遥无期,诉讼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诉讼时间的拖延对当事人双方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证据的提出如果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根本违反诉讼效率的,极有可能在诉讼过程中浪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费用和精力。证据的适时提出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包括举证)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完成,否则,就要承担不利后果,即失权。这促使当事人及时举证,以免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结果就是庭审能够顺利进行,案情易于查明,法官及时作出判决,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证据的适时提出也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诉讼效益是指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来获取的效益,所以诉讼效益和诉讼效率是一致的<sup>[8]</sup>。诉讼效益的提高意味着诉讼成本的减少,一般表现在两方面:国家诉讼成本的减少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减少。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说:“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sup>[9]</sup>证据适时提出有利于当事人在庭审前了解彼此争点,能够在庭审过程中顺利

解决争议，避免多次开庭而增加国家诉讼成本的支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时限制度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法院只负责审查核实证据，认定事实，排除了过去法院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这也减少了国家的诉讼成本。对于当事人而言，与证据的随时提出相比，当事人提供证据集中于一段时间之内，便于一次开庭审结，当事人不至于因为多次开庭而增加诉讼费用。

### 三、强化诚实信用原则

在私法领域，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被确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起诉主张权利，或被诉负担义务者，于诉讼上亦应适用诚信原则乃当然之事。故当事人在诉讼上应为真实之陈述<sup>[10]</sup>。学者一般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故意延滞诉讼；以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在民事诉讼中作虚假陈述，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提供证据中的不正当行为<sup>[11]</sup>。诉讼当事人有权利在庭审前提出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也有权利要求其他当事人披露他们可能掌握的证据，这是司法体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sup>[12]</sup>。也就是说，当事人对证据的披露既是一种诉讼权利，同时又是一种诉讼义务。不过，这种认识也是和司法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1993年美国联邦民诉规则修改之前，一方当事人向对方索取证据和资料，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对方当事人出示所要求的证据和资料也就是一项诉讼义务。而1993年的修改则规定当事人向对方索取证据之前有义务主动向对方出示与当事人请求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然后才有权利向对方索取所需要的资料<sup>[13]</sup>。为此，各国立法均设有种种规定，对凡意图延滞诉讼，超过规定时限才提出攻击与防御方法来进行证据披露的人，一般基于诚实与信用的原则，或者将其诉讼驳回，或者拒绝对迟延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或者直接认可对怠于披露证据一方不利的事实主张为正当，这便是各国对当事人均不在法定和法院以职权限

定的证据披露时限内行使举证权能所产生失权效果的法理基础<sup>[14]</sup>。

“长时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时，为了保护与不行使的行为为利害关系的对方当事人持有的信赖时，可以不再允许当事者行使该权能。”<sup>[15]</sup>举证时限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举证活动、提出证据和事实材料，当事人逾期不举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而有利于敦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提出证据的权利，实际上同时违反了举证的义务，在超过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间后，对第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不予质证或者使其败诉，这说明了规定举证时限有助于强化诉讼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禁止故意迟延诉讼。在美国，联邦法院与多数州法院使用的发现规则防止了当事人以出其不意的战术取得胜诉判决，但这些规则也被当事人滥用。批评者指出发现得到了大堆无用的书面材料，结果是诉讼开支的增长，拖延时间<sup>[16]</sup>。而举证时限对于举证的范围一般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就防止了诉讼拖延的行为，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

### 四、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和解

在庭审前，通过当事人证据的提供，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证据和事实纠纷，知悉争点所在，容易达成共识或者取得妥协和谅解，有利于双方的和解。“因为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调查和交换证据，当事人之间容易取得共识，可使双方当事人都现实地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要求。现在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都在进入开庭审理之前用和解或者其他的当事人之间协商方法得到解决。”<sup>[17]</sup>事实上，在案件的争点及证据明确之后，诉讼的胜负已大致可以预料，判决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当事人往往会斟酌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大小轻重，权衡判决与和解的利弊得失，而选择合意的方式解决纠纷<sup>[18]</sup>。

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下，当事人无法全面、合理地了解对方掌握的证据和事实材料，不知道争点所在，因此，只好求助于法庭解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庭审前也存在纠纷得到解决的极大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之所以求助于公力救济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掌握的证据

和事实材料足以获得胜诉判决。不过,这只是当事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各方当事人对于他方掌握的证据不可能获得全面的了解,对方当事人完全可以利用诉讼技巧,在庭审中提交事先未披露的证据,以达到胜诉的目的。因此,法院的判决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立场来看,证据的获得对于在审判前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当事人更好地估计在案件中各自的优势和弱点。”<sup>[19]</sup>基于证据的及时提出,双方当事人能够在庭审前全面了解对方提交的证据和事实材料,这样,当事人会从现实出发,理性地预测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及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由于败诉方要承担几乎所有的诉讼费用,而法庭审理也不一定是一次完成的,因此,对于在证据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更会考虑在庭审前和解。所以,上述诸方面都为当事人的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

## 五、余论

民事诉讼的程序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过程性。这种过程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手段来完成,但是,这个过程是要有一定期限的,不能仅仅为了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无期限地拖延下去。因此,民事诉讼的理念不能仅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的,更重要的是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毫无疑问,在程序公正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强化诚实信用原则、促使当事人和解方面,举证时限制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功能也在于此。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举证时限制度也有消极的一面。对于各种各样的具体证据而言,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主观上有加速审判进程的愿望,但往往事与愿违,有些证据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取得的。因此,举证时限制度也有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不利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益的一面。不过,任何一种具体法律制度的确立,都意味着价值的取舍。可以说,每一项法律制度都蕴涵着极其深远的价值内涵,都反映着从立法者、执法者到守法者期望追求的价值目标。举证时限制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当事人利用证据进行诉讼袭击,以此来保障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能够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在庭审前了解彼此争点,能够在庭审过程中顺利解决争议,避免多次开庭而降低诉讼效率。在证据的提出方面,

提出证据作为当事人的一项任务,也有助于强化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证据的披露使当事人了解彼此的争议所在,知悉对方掌握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当事人和解。以上诸项分析表明,以证据的适时提出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举证时限制度应是立法及其司法的目标所在。

### 参考文献:

- [1] 江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 [2] 潘剑锋:《论举证时效》,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 [3][15]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5、147页。
- [4]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 [5][13][17] 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86页。
- [6] 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7] 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 [8] 陈桂明、张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 [9] (日)棚漱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 [10] 石志泉:《诚信原则在诉讼上之适用》,载杨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页。
- [11] 石志泉:《诚信原则在诉讼上之适用》,载杨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6页;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44页。
- [12][19] See I.H.Dennis:The Law of Evidence, Sweet&Maxwell (London),1999, p264、265.
- [14]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 [16] 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 [18] 赵晋山:《论审前准备程序》,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页。